

引言

吕一旭

本期《中国省市研究》专辑收录的文章于2007年9月在青岛举行的题为“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上初次面世。这次国际研讨会由悉尼科技大学和青岛海洋大学共同举办，与会者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中国等众多国家，论文作者当中既有享誉世界的专家也有正在攻读博士的青年学者。正如会议代表丰富多姿的不同背景，会议论文以“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为主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探讨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后期香港澳门回归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与西方列强的遭遇。

丰富多姿，百家争鸣是这次会议的突出特点。这就给本专辑的编辑出了一道难题：应该怎样排列这些论文，怎样归类整理呢？每一篇入选的论文都有自身独立性，身后均有一个庞大的学术领域，代表着不同的流派，运用的是不同的研究方法。“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主题，会议论文的多样性与不同性正是这一复杂主题的体现。梳理归类是史学家的天性，直面复杂更是当代史学治学的青岛举办的根本。编者最后选定以“空间”（space）为经串联入选论文。

在此，“空间”首先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或“地区”。从华南农村到天津，从澳门到上海，从香港到青岛，学者们追踪着殖民主义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不同活动及中国社会不同群体对此的反映和应对。其次，是当代史学对传统“空间”定义的扩伸。“空间”一词已从本体论的概念延伸为知识论的概念。“空间”是文化习俗、政治统治和集体记忆互动的产物，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本期发表的论文涵盖各种不同的“殖民空间”（colonial space）和“交往区”（contact zone），从民国海关的航标灯塔到上海的华人股票市场，从德占青岛的华人监狱到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充分显示出殖民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英国学者毕可思的论文《1932年的石碑山—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把我们带回1932年汕头外海一个名叫石碑山的航标灯塔，再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小故事，即灯塔管理员奕伟士（Charles Hugh Edwards）和逐侠诺（Alexander Nickolaevitch Andreyanov）被游击队抓走后悄然死亡一事。论文以这件逸事入手，描述了把这两个外国人安排到石碑山灯塔的体制和社会，揭示了发生在灯塔内部及其周围的种族和阶级冲突，使我们注意到三十年代仍然在中国存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殖民主义世界的影响及其复杂性。正如论文作者所述，透过这一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学习放弃“那些简易的、二元论的定性分析条约口岸世界的做法，取而代之，我们试图直接考察其时态、相互联结和把武宁村、石碑山灯塔站、

厦门、上海及其他更远地方紧紧地网连起来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探讨”，使我们对在中国近现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多样性有更好的理解。

法国学者布莱特-埃斯塔波勒的论文《19 和 20 世纪法国医疗在中国：南方开放港口、租界和租借地的拒绝或依从》从宏观的角度概述了处于法国势力影响范围内的中国南方居民对法国医生及其治疗方法的态度。作者借助于法国档案、地方志和中国医学文本，揭示出隐藏在中国民众对西医态度后面的权力问题。正如作者所述：“帝国以及后来的共和国的政治自主权无疑限制了法国医生的权力，但也有助于减少民众抵制外国医治者及其医疗方法的现象。法国医生对愿意接受治疗的人不得不采取更加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强迫他们来接受。”

意大利学者马利楚着重解读天津意大利租界于 1901—1947 年之间在各种媒体里的重现并探讨这些重现中隐匿的有关意大利租界问题之中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或文化方面的历史原因。论文运用福柯提出的“镜像”与“另类空间”的概念，比较和对照对前意大利租界的不同重现以揭示塑造殖民地知识生产的不同方式和从后殖民主义中派生出来的话语。

澳大利亚学者吕一旭和古德曼的论文以文本学的方式分析著名德国建筑师傅赖义的妹妹伊莉莎白 1913—1914 从天津寄回德国的家信。这些信件不仅记述了一位德国年轻女性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殖民经历，而且详细地说明了“殖民凝视”。然而，家庭成员的日记、信件并非仅是可以让人生动地洞悉日常殖民经历的有用信息源，写作者的目的性可以清楚地影响这类文字资料的真实性。

著名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论文《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 1941—1966》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形式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怎样使香港社会变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同时，经济的飞速发达并没有完全改变香港殖民社会的实质，论文从宏观上揭示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和不同性。

美国凯瑟琳·克莱顿的论文《殖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香港与澳门的文化大革命》探讨 1966—1967 年在香港和澳门发生的一系列反对当地殖民政府的示威游行、暴乱和联合抵制事件以及四十多年后亲历这些事件者是如何评价其意义的。作者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方法探索事件的亲历者，尤其是澳门事件的亲历者心中对这些事件的记忆。这些记忆拓现出当时的事件及其后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阶级、种族和政治派别的冲突，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转折点，因为这些事件不仅导致了港澳两地殖民统治的改革，同时也是“香港和澳门居民当今的集体自我意识，包括香港与澳门居民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国大陆居民之间集体自我意识相当可观的差别”的来源。

十里洋场的上海既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象征，又是中国与西方现代化接轨的场地。从各种角度探讨近代上海社会在多种权力机构，经济势力，文化碰撞的特殊历史是这次会议的重点。上海学者冯筱才重构发生在 1904—1905 年的周生有事件，以“同乡抗议”问题为线索，探讨这一清末重要的外交及舆论事件背后的权力声音。作者通过详细的原始资料分析指出，周生有案不是一次重要的民众集体抗议行动：所谓“同乡公愤”，与其说是实际的群众情绪，不如是

上海道台与报馆主笔在文字中有意塑造出来的一种集体形象。建构“同乡”话语实质上是为权力和政治服务的。

美国学者顾德曼以上海二十年代初华人股票市场的迅速兴起及崩溃为例探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问题。论文指出，仅参照经济学常规来解释上海交易所的运作并将其视为渴望现代化的中国人对西方模式的拙劣模仿是不够的。上海作为中西“交往区”（contact zone）的特殊地域性半殖民主义地提供的多重模式的方式、相互限制的殖民权威，政治及民族主义话语等都是催生并推动1920—1921年上海股票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论文透过对那些导致众多上海股票交易所建立的事件和关键人物以及由这一新经济形式衍生的意识形态的概括介绍揭示了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经历的多重不平等权力机构和思想文化的作用，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制造忧患意识的方式。作者指出：“正是民族主义和以民族为导向的历史编纂的极端化词语模糊了人们对复杂的身份认同、混合的机构和遍布全城的跨国资金流动及其关系网的认识。”

法国学者安克强的着眼点也是作为中西“交往区”的上海，但却是较少为人注意的上海租界公墓。论文概述了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上海租界公墓的发展，管理及变迁。重点探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国租界公董局如何制定死亡人口政策，如何利用各种特权确定安葬死者的场所以及如何应付城市变迁及人口增长。论文不仅提供了上海近代社会一段特殊的历史，并从这一特殊的角度借此揭示出殖民主义在上海的运作情况。正如作者所指出，上海的繁荣下掩盖着各种矛盾，死亡也不例外：“城市空间被切成碎片，社会景观也被分割开来。国别不同，人享受到的权利就不同，不管是死亡还是活着。”

毫无疑问，与作为中西“交往区”的上海一样，德国占领下的青岛是研究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专门探讨德占青岛。青岛学者张树枫提供了青岛监狱从被德国殖民者建立到共和国时期的全方位历史。孙立新教授的论文详细追踪德占时期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的形成。来自悉尼科大的朱建君从分析青岛在被占期间得到的多种不同称谓，例如胶州殖民地、胶澳租界、胶澳租借地等入手，揭示出隐藏在这些称谓变化后的历史环境变迁和利益博弈。证明了“今天意义上的胶澳租借地称谓的出现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变化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学者余凯思对青岛社会不同群体在殖民地中的矛盾与互动的分析可被视为这次会议的总结。在详细分析了殖民当局在青岛实施的各种统治策略和规章后，作者又详细探讨了生活在殖民地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这些统治手段和话语。作者认为，青岛殖民社会的生活是复杂多样的，简单地运用殖民者的统治与压迫和被殖民者的反抗与屈服这样的二元论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用作者的话来说：“殖民统治并未存在于一个密封的独立王国之中，通过被殖民者的参与，它受到了重新评价和改变”。青岛殖民社会与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从上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史学对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已彻底摒弃了简单化的政治与道德评价和二元论。线性的宏观叙事逐渐让位于以

空间思维为主导的微观研究。研究者日益注意到被殖民者在殖民主义中的不同参与和应对形式。特别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在与殖民社会的相互纠缠与作用（特别参见本期顾德曼、冯筱才、余凯思的论文），借余凯思的话来说：“青岛的例子已经显示出，在殖民背景下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呈现出的特殊形式，不仅仅源于传统，至少也部分地是殖民背景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纠缠的结果。因此，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改变和变化，不仅是一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画面所提示的那样——内部的、历时的现代化的结果，而且也同样是多重共时进程的结果”。